

走进鲁迅的小说世界

徐 健·著

鲁迅的抉择

学医到从文：解读鲁迅“弃医从文”的深层原因及其意义

鲁迅与小说：人性的表现与鲁迅的小说创作

鲁迅思想与小说创作

鲁迅思想的嬗变：《呐喊 自序》是鲁迅思想的书写史

鲁迅的创作倾向：砍头情结与鲁迅小说中的杀人场景

代表性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狂人：一个奇特而复杂的时代呐喊者

狂人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他具有怎样的思想、行为和心理特征？

孔乙己：一个从“站着”喝酒到“坐着”用手走路的文人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小說《孔乙己》中的主人公，他具有怎样的行为和可憎之处？

阿Q：一个以“非常”手段求生存的“非常”人

阿Q是鲁迅最长的一篇小說《阿Q正传》中的人物，他具有怎样的行为和思想？他是一个集于一身的人物典型，他的人格特征和精神追求是怎

样的？《祝福》中的“我”：行走在“做梦”和“梦醒”之间的灵魂

“我”是鲁迅小說集《彷徨》中的第一篇小說《祝福》中的主人公，他具有怎样的行为和思想？

祥林嫂：一个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

祥林嫂是鲁迅小說《祝福》中的主人公，她具有怎样的行为和思想？

《离婚》中的“我”：行走在“做梦”和“梦醒”之间的灵魂

“我”是鲁迅小說集《彷徨》中的第一篇小說《祝福》中的主人公，他具有怎样的行为和思想？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說，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深入化、多元化、人文化解读

走进鲁迅的小说世界

徐 健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进鲁迅的小说世界/徐健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7-5641-3307-8

I. ①走… II. ①徐… III. ①鲁迅小说—小说研究 IV. ①I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9405 号

走进鲁迅的小说世界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66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3307-8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6.8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2328。

自序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

后来者读着鲁迅的作品，在其营造的文学世界中认识着、了解着并喜欢着这位文学家。

同样，鲁迅，也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

鲁迅以其对传统得失的深刻感悟、对国民性的透彻理解，同时又以渗透着独特人生体验的文学创作吸引着、启迪着并震撼着后来者。

此外，应该看到，鲁迅既有作为革命家的严肃和坚韧的意志，还有作为学者的严谨和冷静的品质。

鲁迅对我们民族劣根性的审视，多破除，多批判，而且总爱把话说到令人震惊的地步，脆弱的灵魂可能难以承受，但非如此又不能惊醒沉睡的国人。

鲁迅在创作中更多表述一种情感、精神，对传统的批判表现得很决绝，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由于时代的隔膜，当代读者读鲁迅的文章可能因不了解其特定的背景与历史内涵，从而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勾勒出不同类型的鲁迅形象。

仰视鲁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神化了”的鲁迅，顶礼膜拜；俯视鲁迅，我们看到的又是一个“矮化了”的鲁迅，谩骂诋毁。

鲁迅就是鲁迅，一个写作者，一个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写作者，一个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能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思想的写作者。

走近鲁迅，了解鲁迅，必须走进鲁迅的作品，因为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品，是作家凝固的思想丰碑。

因研究的视角不同、理念不同,后来者试图通过对鲁迅作品的自我阐释,从不同的角度解读鲁迅的思想,描绘鲁迅为我们营造的精神家园。

本书就是一次艰辛跋涉之后的心绪感悟,尽管还只能算是一次浅层次的触摸,但毕竟已经开始了探索的行程。

让我们在与文学家、思想者鲁迅进行文本对话之后,也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也许这声音很微弱,但同样期许能刺激着世人的耳鼓,给他人一丝感触和一些启迪。

徐 健

2011年8月于海陵

目 录

第一章 鲁迅的抉择.....	1
第一节 学医到从文.....	1
解读鲁迅“弃医从文”的深层原因及其他.....	1
第二节 鲁迅与小说.....	6
人性的表现与鲁迅的小说创作.....	6
第二章 鲁迅思想与小说创作	12
第一节 鲁迅思想与小说创作倾向	12
一、鲁迅思想的嬗变	12
《呐喊·自序》:鲁迅思想的书序体自传	12
二、鲁迅的创作倾向	19
砍头情结与鲁迅小说中的杀人场景	20
第二节 代表性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30
一、狂人:一个奇特而复杂的时代呐喊者	31
狂人,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的主人翁,在他的“狂”的行为背后,折射出其怎样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	
二、孔乙己:一个从“站着”喝酒到“坐着”用手走路的人	43
孔乙己,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孔乙己》中的人物,鲁迅为什么独爱孔乙己? 其人物形象有何可喜和可惜之处?	
三、阿 Q:一个以“非常”手段求生存的“非常”人	49
阿 Q,是鲁迅最长的一篇小说《阿 Q 正传》中的人物,他是“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但作为集中国国民性问题于一身的人物典型,他的人格特征和精神追求是怎样的?	
四、《祝福》中的“我”:行走在“做梦”和“梦醒”之中	68
“我”,是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的第一篇小说《祝福》里与祥林嫂故事交织在一起的人物,除了作为小说的叙述结构人物的作用外,这一与祥林嫂命运共	

生但不能共存的“我”，还向读者言传了怎样的信息？	
五、七大人：一个封建专制制度的活化符号	81
《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也是揭露和抨击封建礼教、封建社会秩序，为社会底层妇女鸣不平的代表性作品。小说中的爱姑在“离婚”抗争中终因“七大人”的出场而以悲剧结局，“七大人”为何有如此大的力量？	
第三章 鲁迅小说艺术的综合分析	95
第一节 鲁迅小说的语言：20 世纪初语言现代化进程中的丰碑	95
一、语言的精简化：以有限的词语营造无限的意境	96
二、语言的色彩化：以平实的文字传递多样的心境	98
三、语言的个性化：以独特的言语塑造个性的情境	100
四、语言的鲜活化：以多样的修辞营构特指的语境	101
第二节 鲁迅的社群意识与小说中的人物群像塑造	105
一、鲁迅对个体价值的认识及其社群意识的形成	106
二、人物群像的塑造和社群意识的揭示	107
第三节 鲁迅小说中的寡妇形象与作家的创作心态	113
一、鲁迅小说中的寡妇形象的类型分析和形象意义	113
二、鲁迅的寡妇形象创作心态	117
第四节 鲁迅小说中的狗意象分析	123
一、狗意象的内涵	123
二、狗意象的本质	126
附录一：鲁迅年表	130
附录二：鲁迅小说目录	139
附录三：鲁迅著作目录	140
后记	142

第一节 学医到从文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呐喊》自序

由此可见,幼年的鲁迅之所以会选择学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 痛恨:中医未能医治好身患重疾的父亲。
- 同情:被中医以愚养欺骗的病人和他的家属。
- 感悟:日本维新强国之路发端于西方医学。

然而,后来的鲁迅最终并没有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良医,却成了一名享誉中国现代文坛的文学旗手。

原因何在?

解读鲁迅“弃医从文”的深层原因及其他

摘要:结合十九世纪国内外社会发展的背景,从鲁迅留学日本时期日本国民性大讨论对鲁迅思想影响的新视角,以及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对社会舆论钳制的社会原因,揭示鲁迅“弃医从文”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鲁迅 弃医从文 原因

自从《呐喊·自序》选进中学语文教材后,对于鲁迅的“弃医从文”之说,学习者似乎总能在鲁迅的这段叙述中找到答案,“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

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但我们认为,鲁迅的这种变化固然离不开“幻灯事件”给他带来的最强烈最直接的刺激,此外,还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原因一:日本社会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对鲁迅的熏陶。鲁迅留日之时,正是日俄战争爆发之期。始于1904年2月,迄于1905年9月的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在华利益再分配的非正义战争。战火在中国的领土上燃烧,损害的是中国人民的利益,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后起的东方帝国日本赢了老大西洋帝国沙俄。日本的战胜,让全世界为之瞩目,也使得日本国内民族主义空前高涨。身在日本的鲁迅,耳濡目染了日本国民的这种民族情绪,也必然会由此对自己祖国的民族前途产生思考。

原因二:日本“国民性”理论的研究对鲁迅的启发。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时,课余喜欢看哲学书、文学书,由此关注起国民性来。明治时期,日本讨论国民性的文章和言论大量出现。例如:浮田和民的《伟大国民的特性》(《太阳》第8卷第10号,1902年8月)、井上圆了的《日本人的短处》(《太阳》第9卷第14号,1903年12月)、渡边国武的《日本国民的能力》(《太阳》第10卷第1号,1904年1月)、千叶江东的《悲观的国民》(《日本人》三次第203号,1904年1月)、泽柳政太郎的《战争与国民精神》(《太阳》第11卷第11号,1905年9月)、贺芳矢一的《国民性十论》(富山书屋,1907年12月)等等。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强盛国家的目的。日本著名评论家、时任《太阳》杂志主编的高山敏牛就曾这样说过:“国家的真正发达,只能基于国民的自觉心。有了国民的自觉心才能客观地认识民族的特性。”(《赞日本主义》,《太阳》第3卷第13号)这些对身处明治日本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着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和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的鲁迅具有直接的影响。

原因三:寄人篱下的屈辱留学生活对鲁迅自尊心的触动。1902年3月鲁迅到日本留学。1905年,24岁的鲁迅却选择了到距离东京很远的仙台医专学医,为什么?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说,“本来在千叶和金泽地方,也都设立有医学专门学校,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由此可见,去仙台留学对于青年鲁迅的意义并非仅仅

是学习医学,同时也是为了逃离中国留日学生群体,因为鲁迅看不惯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醉生梦死的生活。在鲁迅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中也清晰地展示了鲁迅对“清国留学生”的不满与其离开东京去仙台之间的因果关系。文章的第一节是写樱花烂漫的时节“清国留学生”速成班的学生们到上野公园去看樱花,“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描写中依然包含着讽刺与厌恶。第二节写留学生们在中国留学生会馆里学跳舞,“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于是,文章第三节就只有一句话,“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第四节的开头便是“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在仙台医专第一学期,鲁迅期末考试的成绩仅仅属于中等,便受到日本同学的怀疑,甚至有人检查藤野先生给他修改过的笔记。20年后提起这件事鲁迅的感叹依然是,“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中国留日学生的醉生梦死和日本学生对鲁迅的歧视,迫使鲁迅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中国人的能力和尊严。

以上这些原因,使得鲁迅毅然于1906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返回东京后,鲁迅开始参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1907年以文言文撰写了4篇论文:(1)《人之历史》,原题为《人间的历史》,最先发表于1907年12月《河南》月刊第一号。1926年由作者编入杂文集《坟》时,改题为《人之历史》。这是鲁迅最早介绍西方生物进化学说的一篇论文。该文比较系统地解释了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的一元论种系发生学,同时也简述了拉马克(Jean de Lamarck, 1744—1829)和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等人有关生物进化论的一些重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鲁迅早期的思想基础。(2)《科学史教篇》,作于1907年,最初发表于1908年6月《河南》月刊第五号,署名令飞。这是鲁迅早期论述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一篇重要论文。文中肯定了自然科学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揭示了科学对近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作用,论述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其意在于抨击当时国内那些抱残守缺、主张复古倒退的顽固派。(3)《文化偏至论》,作于1907年,最初发表于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七号,署名迅行。此文的要旨是“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在提倡精神自由和个性发展的同时,指陈资产阶级文化的偏颇性,批评那些华而不实、虚伪欺骗、“竞言武事”的洋务派,称他们为“桀才小慧之徒”。对于那些留学国外、热衷于洋务

运动的人士，鲁迅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浅薄与自欺欺人的行径，说他们“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4）《摩罗诗力说》^①，作于1907年，1908年2~3月连载于《河南》月刊第二号和第三号，其主旨是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摩罗诗派为美学导向，以文学革命为运作手段，以启蒙新民、改良社会为终极目的。研究表明，1906年—1909年，鲁迅在日本东京的这三年，为其以后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应该看到，鲁迅选择文艺之路，并从事文艺也绝非偶然。

一是鲁迅自身对文艺的热爱。童年的鲁迅就对文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事》中回忆，“终身爱好镌刻艺术。童年和少年时爱好描摹传统木刻和石板书籍，17岁写《戛剑生杂记》，19、20岁时写《别诸弟》和《惜花》等散文和诗”。这些都说明孩提时代的鲁迅对文艺就情有独钟。

二是当时倡导文艺的学者对鲁迅的影响。严复《天演论》所宣扬的进化论和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所标举的“小说界革命”思潮对鲁迅的影响特别大。首先是严复的《天演论》以物种生灭的自然进化规律，警告我们亡国亡种的危险，激发起国人的发奋自强。据当时的《民报》记载：“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而“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包括革命派在内，都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救亡的理论武器”（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鲁迅也不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在二十年代下半叶曾说，他过去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大革命的血腥屠杀才使他纠正了相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也许是在我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早对进化论进行自省的人。其次是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力主提高小说地位，要求小说为“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服务，将小说视为政治变革的一个工具。这一观念的提出，对提高小说的地位和促进小说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三是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对社会舆论的钳制迫使鲁迅等思想启蒙者选择

^① 《摩罗诗力说》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摩罗”一词，是梵语音译，也有译作“魔罗”，或简化为“魔”。

文艺。当鲁迅于1906年在日本仙台决定弃医从文时,中国的新闻也在1906年被宣布了死刑。“警部新定报律:外城巡警总厅现奉巡警部札订报章应守规则:一不得诋毁宫廷;一不得妨害治安;一不得败坏风俗;一凡关外交内政之件,如经该管衙门传谕报馆,秘密者该报馆不得揭载;一凡关涉词讼之案于未定案以前,该报馆不得妄下断语,并不得庇护犯人之语;一不得发人之隐私,诽谤人之名誉;一记载有错误失实,经本人或有关系人声请更正者皆须速为更正;一除已开报馆之外,欲开设者皆须来厅呈报批准后再行开放”(《盛京时报》第3号)。1909年,也就是鲁迅从日本回国的那一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欺骗舆论,维护皇权。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为控制社会舆论,于1913年残酷迫害和扼杀国民党报刊及其他持不同政见的报刊,史称“癸丑报灾”。1914年4月2日,袁世凯政府还公布了《报纸条例》,规定报纸于发行之日须递送警察官署存查,凡涉“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事情,一律不准登载。政府对舆论的钳制、思想的束缚,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做起“文字游戏”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鸳鸯蝴蝶——礼拜六派。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在刊物的发刊词宣扬,“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礼拜六〉出版赘言》,载《礼拜六》1914年第1期);同时也强调,“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谏讽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眉语〉宣言》,载《眉语》1914年第1卷第1号)。虽然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也以“警世觉民”作为自己的文学理念,但自称“文学劳工”的他们在其文学实践中难免不走向“游戏”和“消遣”。在文艺启蒙的大旗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作为批判的对象,以文化作为整个国民性理论的基点,大胆质疑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的召唤下,鲁迅毅然决然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救国之路。

参考文献

- [1] 温儒敏. 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J].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4)
- [2] 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 北京:人文书店, 1932
- [3] 王柯平. 《摩罗诗力说》与摩罗式崇高诗学[J]. 鲁迅研究月刊, 2005(4)

第二节 鲁迅与小说

鲁迅走上文坛并为人们所熟知,是因其小说的创作。

为什么偏偏是鲁迅?

为什么鲁迅选择的偏偏是小说这种文学样式?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 改变对小说的认识:当时的中国,小说称不上文学。鲁迅要把小说看成是“为人生的艺术”。

■ 变革小说的功能:利用小说改良社会,扩大小说的题材范围,发挥小说的启蒙作用。

人性的表现与鲁迅的小说创作

摘要:分析鲁迅选择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原因,揭示其将小说的创作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的背景意义,从表现人性的角度正确理解鲁迅小说创作的启蒙作用。

关键词:鲁迅 小说 国民性 启蒙

与20世纪初叶的其他先进的知识分子严复、梁启超、胡适以及他们的先驱魏源一样,鲁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探寻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之路。

出于强国报国的目的,鲁迅首先对“坚船利炮”发生兴趣,并于1898年5月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军事。后因对教学与师资等条件深表失望,故决定弃军从理,于1899年1月转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专事理工科目。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后又决定

弃理从医，立志学好医术，医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名医”耽误了的病人。但是，与当时的其他精英不同的是，当鲁迅看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医学救国”之路不通时，他毅然选择了“文艺救国”的道路。

但鲁迅最初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所以，鲁迅的小说实践首先始于对国外小说的译介。《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在日本以文艺来改造社会“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于是，鲁迅和许寿裳、周作人计划创办《新生》文艺杂志，失败（1907年）后，写作了《摩罗诗力说》（1907年），号召以文艺来改造社会，又和周作人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1909年）。

其次，始于幼年的鲁迅对小说就有兴趣。鲁迅与小说有缘，始于祖父周介孚的特别的教育法，“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奖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小说，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自己的园地·镜花缘》，见《周作人散文选》第1集，第447页，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甚至传言少年鲁迅避难舅家时，读到很多“无从见到”的小说，而且他“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周遐寿（周作人）：《鲁迅的故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少年时代非正规教育的旷野阅读趣味，为鲁迅日后从事小说的创作埋下了最初的精神动因。

再次，基于对中国小说的研究。1909年归国后，鲁迅赴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化学、生物学教员，又返绍兴府中学堂任监学，兼教博物学，此期间辑录出从周到隋的散佚小说36种，成《古小说钩沉》。1911年在绍兴府中学堂时期，又业余抄录《穆天子传》，并辑录《搜神记》、《神异经》等七种书，成《小说备校》。1920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同时从七十种左右的明清人著述和地方志中，辑述小说源流、评说等方面的材料，被评说的小说有四十一一种，成《小说旧闻钞》。所谓“钩沉”，是说文献材料已经沉没难觅，需要从头钩取，正是出自同样的意念，他这种文献辑录工作是非常艰辛，但是唯有它才是原始创新的可靠的基石。鲁迅这样诉说艰辛：“《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由于有了这番锐意穷搜的硬功夫，他才能打破传统文化雅俗观的成见，“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成就

了为小说写史立名的真学问。而且由于有了这番硬功夫，他才能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结构体例、名目论定和独立见解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回答论敌关于这部史略剽窃日本盐谷温的著作时，堂堂正正地以此为据：“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

最后，成于身体力行的白话小说创作。无论从创作时间之早，思想容量之大，还是从艺术质量之高来说，鲁迅《狂人日记》的开山地位都是无可动摇的。它也同样奠定了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地位。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的小说一发不收，分别收编在三部小说集《呐喊》（1918—1922年）、《彷徨》（1924—1925年）和《故事新编》中。

中国的小说，也只有到了鲁迅那里，才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尤其在塑造人物方面，鲁迅有一种近乎神奇的本领，往往寥寥几笔，就能使人物栩栩如生，形神毕肖。他的小说不多，却能创造出狂人、阿Q、祥林嫂、孔乙己、魏连殳等一系列出色的典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辉煌的成功。

20世纪的中国，存在两大主题：启蒙和救亡。启蒙意味着人的意识的觉醒，救亡意味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20世纪涉及中国文化的历史转型和思想变革的一个重要思潮。这一思想虽然并非鲁迅一人所为，但鲁迅因其思想的独到性和深刻性成为这一思潮的最重要、最杰出的代表。

在“五四”国民性思想家中，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对“人”的性质和价值进行了分析，从而使“人的文学”理念得到了确立。胡适是第一个把“个人”和“社会”结合起来思考改造国民性的第一人，但在具体的改造方法上胡适却是软弱无力的。鲁迅，这位创造新文学实绩最丰的人，他认为治文学的目的是“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作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对“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的文艺，鲁迅深恶痛绝，后来在《论睁了眼看》（1925年）一文里严加痛斥：“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据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回忆，早在日本时，鲁迅常常考虑三个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从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出发，鲁迅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强调“立人”，他呵护人的尊严，他批判传统中国是“无爱的人间”，并形成了他关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整体构架。

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下，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导致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形成。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是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病根。所以在揭露中国国民劣根性时，鲁迅喜欢用冷峻的笔触去表现中国国民的人性弱点，难怪读过鲁迅作品的人会说，鲁迅的作品对中国国民的阴暗面揭露得较多。事实上，这与鲁迅的文学审美追求是一致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悲剧就是把美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此言明确表达了鲁迅的文学创作活动同改造“国民性”之间的关系。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为：（1）形成了鲁迅作品以发掘和揭示民族性格弱点，透视民族深层精神世界，努力刻画“国民灵魂”的创作主导倾向，显示了鲁迅作品在主题上的独创性；（2）形成了鲁迅作品一系列具有民族精神特点和文化内涵的艺术典型，如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显示了鲁迅作品在形象表现上的独特性；（3）形成了鲁迅作品悲剧与喜剧相结合的美学风格、激情与冷峻相结合的表达风格、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显示了鲁迅作品在艺术风格上的独创性。

从启蒙主义出发，鲁迅希望通过对民族性格弱点的批判，唤起民众的注意和觉醒，促进民族素质的改造。但是，鲁迅在立足于启蒙的同时，又对启蒙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启蒙的目的，不是强制读者接受某种观念而是引导读者使用自己的理智。启蒙不但不会妨碍读者的精神自由，相反正是为了破除对读者精神自由的束缚，所以从改造“国民性”思想入手研究鲁迅及其文学创作，是开掘鲁迅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文学矿藏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入口。

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从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文学史的角度看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鲁迅是从中国社会发展这个大方向上把握住了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关键问题，从而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时代课题。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我们在咀嚼鲁迅作品中所揭示的国民特性的同时，也应该继续审视我们自己，在探究中华民族心理特征的过程中把握住我们民族的优秀心理特质。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

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介绍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介绍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 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们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但他称我为 Stylist^①。

① 英语：文体家。（作者注）